

“库布其模式”的那一种叙事

本报记者 高爽

提示 “中国第七大沙漠——库布其沙漠的生态治理堪称当代人类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的最伟大成就之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前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语)。近些年,库布其模式屡屡被人提起,也进入了文学书写,最近的一次就是今年新出版的这本《大漠流金——中国库布其精准扶贫纪实》。

这一版的库布其故事有何特别之处?本报记者专访该书作者王占义、杨春风。



沙漠嬗变:库布其印象

本报记者:两位都与库布其沙漠有着不小缘分,一位是土生土长的库布其之子,一位是对库布其有相当了解并于2019年创作出版了《春归库布其》(合著)的辽宁作家。请分别说说你们眼中

“静态”和“动态”的库布其吧。

王占义:从儿时起,沙漠一直是记忆深处最深刻、最难以磨灭的印象符号。静态来说,沙漠给我们这些人带来了无尽的烦恼与苦难。日常生活中,吃饭时碗里有沙子,睡觉时被窝里有沙子,一觉醒来,昨晚的风沙把门给堵住了,连房子都被沙子埋了一半,要从窗户爬出去,从外面清理沙子。由于沙漠的阻隔,我们缺医少药,和外界交流严重受阻。小时候,沙漠和贫穷是一对孪生兄弟,相伴相生,沙漠加剧了贫穷,贫穷带来的资源稀缺、人才外流,也让沙漠更加难以改变。虽然多年前的沙漠是贫瘠的,但毕竟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是我们的故乡,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在年岁渐长之后,也希望改变这里。动态来说,近几年来沙漠变化喜人,更加令人欣喜的是人的变化。我认识一位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他去过并拍摄过全球所有大型沙漠。他告诉我们,全球沙漠最令人绝望之处在于,当地走出去的人不愿意回去,没有新的人才,就很难看到希望。而库布其沙漠给他最深刻的印象在于,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回到或者来到这里,这是他在全球其他地方所没有看到过的。

杨春风:在“绿起来”之前,库布其沙漠或许就当用“静态”来表述,因为当年时间在那里的流动是缓慢的,大漠深处的牧民即使是去最近的邻居家串个门,也需骑马走上几个小时,而且并没有谁觉得那过于“慢”了;在“绿起来”的进程中,在“穿沙公路”也随之在这片大漠里一条又一条地得以筑就并畅通之后,库布其沙漠的时间流逝才渐渐与外界达到了同步,且慢慢地也可用“日新月

异”来形容了,这片大漠也就此成为“动态”的,自身生机无限,外人也可、愿常来常往了。换言之,“静态”的库布其在外人眼里是令人“绝望”的,“动态”的库布其则已成了外人心目中最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两者的区分就在于绿与未绿、通与未通,它的容颜决定了自身属性及社会价值。

改变认知 库布其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本报记者:此前也读过很多关于库布其的报道和文学作品,包括《春归库布其》,都写到了库布其发展中遇到的诸多困难和阻力,本书也不例外,但感觉二位在叙述这些困难的时候,更多的笔墨已放在了人们的心态变化上,使本书堪称是一部库布其人的心灵成长史。这一点为何会成为你们的关注点?

王占义:库布其沙漠的扶贫历程,我觉得给世界的最大贡献在于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沙漠关系的固有印象。人一直与沙漠和其他生态恶劣的环境抗争,试图改变,这并没有错,但库布其的治贫历程,是从恐惧沙漠,对抗沙漠,到真正研究沙漠,认识沙漠,利用沙漠,找到人与沙漠共存的途径,最终从沙漠中获取财富,获得成功。这种心态变化,认识的进步,不仅促成了当地人的心灵成长,更是库布其变迁给予世界最大的启示。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同出一脉,也是中国人民的智慧结晶,是中国带给世界的启示。这些启示,在世界生态环境压力与日俱增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杨春风:如果说《春归库布其》以库布其沙漠的“绿起来”为

核心叙述,那么本书则聚焦库布其沙漠“富起来”的进程。通常的看法是“富起来”为“绿起来”的进一步深化,二者是一种递进关系,这样的关系也属实存在,不过相互间并不存在一条严谨分明的界线。实际上在“绿起来”的进程中,那些陆续参与到这场“战役”的库布其人就已经相继“富起来”了。本书更核心的关注群体是那些因种种原因未能在2021年之前就实现富裕的库布其人,这部分人也恰恰是“精准扶贫”的主体受众。表面上看,这是库布其沙漠“致绿”“致富”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库布其人的心路变迁历程,折射了他们打破或被动打破传统生活方式的一个渐进过程,且过程中可能没有迟疑、彷徨与不舍。这种复杂心情是能够令人感同身受的,也是值得仔细关注的,尤其是在引入库布其模式的过程中需要特别留意的。唯有心理上的成长在先,其他的质变才有望发生。

人物群像:多元呈现

本报记者:从根沙到治沙再到沙里淘金甚至爱沙,这个探究的过程很迷人,也很复杂。写作的过程中你们是如何对海量信息进行取舍的?

王占义:我们主要还是聚焦于“人”,希望在充分掌握素材的基础上,把焦点集中到沙漠中的人的生活与命运变化上。他们既是库布其变迁的主角,也是变迁的根本原因。当地政府、亿利集团这些既是治沙扶贫的带头人,又是当地人民的一分子。库布其沙漠变迁所赖以实现的技术革新、绿富同兴,其发轫者都是这些人,是他们不断思考、不懈努力的

成果。因此,我们在确保资料翔实的基础上,尽量多去展现这些沙漠里面居民和治沙扶贫工作者的生活轨迹。在选取人物过程中,尽量包含老中青几代库布其人,从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不同背景的视角去呈现这些故事。此外,人们从恨沙,到沙里淘金,到爱沙这样的认识转变,绝对是一蹴而就而突然醍醐灌顶的,而是在长期艰苦卓绝的与沙共存、与风为伴的生活中逐步实现的。当然,这样的转变是有一些关键节点的,党和政府的引领、亿利集团和王文彪的带头、技术人员的探索思考推动技术进步,都是实现这种转变的触媒。我们注意到,在外界来库布其探究沙漠变迁的人中,很多外国人更加注重沙漠当地人的命运变迁,喜欢去拍摄,去询问当地人。不仅是环境变化,其中人的命运变化往往更触动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此外,他们对库布其治沙的技术也很感兴趣,特别乐意与技术人员交流学习,即使他们国家并没有沙漠。

杨春风:对材料的挖掘与组织,就是围绕着你所说的这个链条进行的,而这个链条也正是库布其沙漠在业已过去的数十年中所经历的变迁。应该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库布其人的奋斗方向,就像一盏明亮的灯塔,使人在挫折中坚定前进的信念,而这也是社会各种力量得以拧成一股劲儿又劲儿往一处使的核心支撑。作为书写者,我们所做的就是挖掘、梳理并串联起所有能够真实反映这一客观进程的有效材料,使之得以生动地再现,以期给仍在承受着荒漠化之患的国家或地区以有益的参照或启迪。

聊书

一餐美食 一场记忆

永刚

这几本书,你一定要看。看完,你才敢说自己真的会吃。

但是,不要在饿的时候看。讲真。

费雪是美国版大长今,欧美饮食文学掌门人。她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挚爱自杀,见证了精彩,也尝遍了艰辛——却改乐观,坚持独特的饮食原则。费雪在传统保守的美国乡间长大,祖母每天蒸牛奶蒸苏打饼干,长辈善于谈论食欲,仿佛臣服于任何欲望都是可耻的,再好吃的食物也不能感叹赞美。在仿佛精美饮食是种耻辱的禁欲氛围里,费雪却天生钟情于斑斓的色彩,诱人的气味,丰富的味道以及那一切美食背后,人们倾注的感情与期待的欢愉。

费雪在高雅的寄宿女子学校,在横跨大西洋的邮轮上,异国的穷街陋巷公寓里,不断地发现能够抚慰自己与爱人的美好饮食和与之相关的故事。

正是这种旺盛的生命力,让费雪穿越了战争的阴霾,挨过了人生的悲剧,“在屋子里死寂一片时,在自己心如死灰时”,仍旧能不期而遇地为自己准备一餐。这不仅是烹饪书,而是活色生香的生命编年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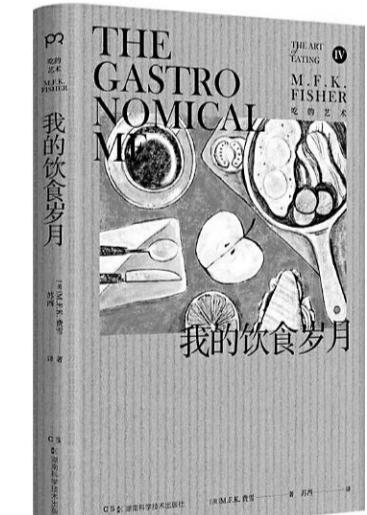
中国饕餮神片《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晓卿的作品。“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是一句人人会说的套话。但是只有把这当作一种生活信仰的人,才会融入灵魂地琢磨一餐一饭的滋味魅力及冷热酸甜苦辣咸搭配之后的神奇。陈晓卿就是这样的人。他对食物细致入微的体会,对往事细节中氤氲香气的描述,透露出一个人对生活敏感的审美,对人群的洞察与体谅。

美食,说到底,是极为个人的体验与评价,就像人生阅历形成千差万别的价值观。刚出炉的面包和包子,有热乎的香气,涮锅子非得热气腾腾,这氛围也叫“镬气”,有人就好这口儿,非得灶台锅边,趁热吃,才心满意足。可是陈晓卿一方面热爱“镬气”的拥护者,一方面却最喜欢教九寒天,带着冰碴儿吃冷面。到底什么是美食,别说美食家们争论不休,只怕一个人自己都会自相矛盾。

每一顿让人心满意足的饭菜总是在合适的场合,与合适的人,吃下去。一餐美食,一场记忆,是时间与情感酝酿之后的人间至味。

如果吃饭只局限于色香味,那人人都可以指手画脚说两句。涉及科学的分析,实证的应用,美食家就要后退,科学家走到前台。王立铭是个货真价实的科学家,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研究能量代谢。专业能在顶尖实验室里搞科研;科普能把科学理论讲成朋友圈刷屏的段子。王立铭严谨而幽默,他一再强调这不是一本养生之书,而是一本关于疾病的科学书,科学在不断前进,但不能承诺,总能立见影有办法。

中国人“够吃”已经实现,如何对待“吃不够”就成了新课题。为啥无论怎么控制,还是掉进脂肪、糖分这让更多人沦陷的陷阱?减肥和美食,只能二选一?这其中DNA的秘密,科学家为此付出的努力,已经解开的谜题,目前安全应用的方法,尚未解决的难题,作为一个合格全面的吃货,这本书,你一定要看,看完,你才敢说自己的会吃。



《我的饮食岁月》



《至味在人间》



《吃货的生物学修养》

心有不甘的萧红

张爱玲

·

的孤寂,说出一句让人想笑又想流泪的童言稚语:“爷爷,我没长大时,你该是多么寂寞啊!”

在萧红笔下,父亲从没正眼看过她。父亲那双并不大的利眸,总是从某个角度蔑视她。萧红每从父亲身边走过,都觉得那两束很不友善的目光仿若万枚钢针刺骨,令她浑身一颤。萧红从未奢想过像其他孩子一样,在父亲怀里撒娇逗宠。母亲待她也好不到哪儿去,只是不像父亲那么凶恶。在萧红情感记忆中,父爱母爱都是一片空白。

萧红回忆说:“父亲常常为了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仆人,对待自己的女儿,以及对待我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萧红曾问她弟弟:“我真的但是他亲生的吗?”在家庭生活中得不到温暖和爱,年幼的萧红心有不甘。

到了上学年纪,父亲不愿让女儿上学。萧红父亲在呼兰县教育界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做过类似教育局长的官职,碍于身份,顾及面子,父亲最终让萧红上了小学。

小学毕业后,萧红憧憬着即将开始的中学生活。小学是在呼兰县的,离

家很近,中学则要到几十里外的哈尔滨市里去上。萧红对外面的世界、对未来充满向往,沉浸在美好愿景之中。没想到,一盆冰冷的水突然从她的头顶浇下来。父亲发话:“你不必接着读书了!”彼时的萧红,不再是走在父亲面前都战战兢兢的那个幼年萧红。念完小学的萧红,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到了少年心理叛逆期。她敢于向父亲说不,挑战父亲权威。“如果你不让我读书,我就削发为尼!”萧红倔强地站在父亲面前,不卑不亢地对父亲说。萧红的反抗取得胜利,随后到哈尔滨成为一名寄宿女中的学生。这一步很关键,走不出这一步,或许便没有后来的女作家萧红。

走出呼兰县,萧红顿感天地宽阔。随后,父亲做主强加给她一桩婚姻。她心有不甘。萧红聪明起来,父亲催婚,她不再硬抗,而是耍了一个小小计谋。她佯装答应这门婚事,且积极筹备婚礼。向家里要一笔钱,谎称去哈尔滨中央大街买婚礼用品。钱一到手,萧红远走高飞,去她向往已久的北平。由此,萧红摇身一变,成为一名追求新文化的新式女子。穿起西装,剪成短发,开始一种全新生活。

逃婚后,萧红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出现了。他叫萧军,时为一家报社撰稿人。萧红受困于哈尔滨时曾写信向报社求救,报社托萧军前往解救,上演了文学史上有名的英雄救美的故事。救美成功,世间便少了一个名叫张迺莹的女孩,多了一个名叫萧红的文艺女青年。

萧红一直都爱着萧军。哪怕到最后,萧红在临终前还想到萧军,将自己部分著作授权予萧军。因二人在人生去向上有重大分歧,后来还是选择放手。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萧红逃到香港。

她有病在身,得不到必要的治疗。1942年,年仅31岁的北方女子萧红的生命,悄然画上句号。

萧红临死前,突然叫身边人拿来纸和笔。那人以为萧红有了灵感,要写文章。哪知她在纸上写道:“我将与碧水蓝天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遭尽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萧红一生写下了100多万字文学作品,这段文字可谓是她的绝笔。其实,它正是萧红一生的真实写照。

萧红的人生,从头到尾,充满了不甘。至死,萧红还是心有不甘。

戴上罗伊的“眼镜”读小说

成玮

·

西,比如列表、排序和命名等”,涉猎之广足见一斑。

在广泛多样的文本中,许多写法反复回响,印证着自身的有效性。譬如著者研读海明威时指出:“诅咒变祝福,或祝福变诅咒,是文学和新闻写作中历史最长的一种叙事方式。”雪莉·杰克逊《摸彩》和苏珊·柯林斯《饥饿游戏》,可以共享同一模式。他也带我们发掘菲茨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循环往复的绿灯意象。关于纳博科夫《洛丽塔》那个著名的开篇“my sin, my soul”(我的罪恶,我的灵魂),他则提示我们:“sin和soul这两个不同的词互相摩擦着,但又好像在试图逃脱对方。”读者们只要拿眼睛去看,还要开口念诵。

统观全书章节,不见明显规划。著者一部又一部作品分析下去,年代、类型纷然杂陈,论题也错落无序。这似乎更接近文学阅读的理想状态:在杰作之间即兴游弋,无问东西。兴之所至,他甚至单辟一章,品读费雪的美食书写,并建议我们“去研究一些非文学的表现形式,比如菜谱;学习一些可以应用到文学和新闻报道中的东

之。讲到《愤怒的葡萄》,他不得不承认:“我一直都以为,副词是语言中作用非常弱的部分,但斯坦贝克竟然在这部名作中用‘神秘地’这个词作为小说的最后一个词”,成品倒也不差。观乎此,我们对于如何看待书中所授技巧,即可思过半矣。

写作是门手艺。在西方,实打实,把手教人读写之术的书籍层出不穷,本书只是其中一册。流风所及,不少文学从业者均具细读本领。诗人布罗茨基能就奥登长诗《1939年9月1日》句悟字比(文见所著《小于一》),理论家特里·伊格顿也能写出《如何读诗》《文学阅读指南》这样的导引著作。批评家自不待言。詹姆斯·伍德既不吝指出索尔·贝娄怎样打开感官,看见冰柱底端欲滴的水珠似在燃烧(《索尔·贝娄的喜剧风格》),又不惮揭破约翰·勒卡雷小说中,“细节的选择只不过刚好凑够数量可以说服读者这是‘真的’”,不称之为“商业现实主义”(《小说机杼·真相、传统,现实主义》),褒贬各得其所。反观中国,抽绎文术之作原不匮乏。南朝《文心雕龙》已可视为

为《文章作法精义》(王运熙《文心雕龙是怎样一部书》)。宋元以降评点兴起,有些更是擘肌分理、契入微芒。如今这传统似乎渐行渐远。说起文本解读与写作,玄思高论时一遇之,度人金针却罕闻消息。居常想望,倘若我们也有一群精通写作技艺的作者,撰写导读以接引后学,那就该多好!在这个意义上,《25堂文学解剖课》不失为又一次提醒。

总有人天真地质问:文学有什么用?也是,作者精心建造纸张上楼阁,读者潜心玩索,大家所为何来?本书主旨虽在谈写作技巧,无意间也道出了缘由。众所周知,普拉斯的《钟形罩》自传色彩甚浓,那个患上精神疾病被电击的“我”,便是普拉斯的文学替身。赏析到一半,克拉克不禁停下感慨:“如此阴郁、如此有自我毁灭倾向的一个精神体,怎么还会找到一个地方,去玩语言游戏呀?这真是艺术上的一个谜。”我以为,这一问本身,已然是个完满无缺的解答。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言文学系副教授)

西尔维娅·普拉斯的小说《钟形罩》这样开头:“那是个奇怪的、闷热的夏天,那个夏天他们把罗森堡夫妇处了死刑,我不知道当时我在纽约正在做什么。”其间有何妙处?我们看到,整句话由一个季节转向一个时代,又转向一个困惑的单身年轻女子,快速推进。然而某些成分吸走了读者眼光。“奇怪”的是抽象判断,“闷热的”突降至具体可感的层面,搭配饶有张力。从季节接到“我”,本来自然而然,可是不相干的罗森堡夫妇偏横亘在中间,使得句子不尽平坦。直待后面回想,我们才恍然大悟:这对夫妇并非多余,而是预警信号。他们被控间谍罪,处以死刑,是美国麦卡锡时代轰动一时的新闻。这对应着“我”被诊断为精神病患、遭受电击治疗的命运。一句不长的开头,隐然预言了整部小说。

上述分析来自罗伊·彼得·克拉克,他称之为“X射线阅读”——就是深层细读的意思。其《25堂文学解剖课》持这种射线透视各类文本,传授阅读方法,也启迪写作技巧。

这是一本实践手册。即便谈